

蘇聯作家答英國作家問

談蘇聯文學

莊壽慈譯





談 蘇 聯 文 學

一九四九年五月華北一版

基本定價：三元

英蘇文化協會文學部於一九四六年建議英蘇兩國作家用書面問答的方式，交換關於文學問題的意見。接着，蘇聯作家便提出了若干問題送往英國，這些問題曾在倫敦，及其他城市的作家會議上予以廣泛的討論。當英國作家們回答這些問題時，向他們蘇聯的同業提出了若干有關蘇聯文學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在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文學部的會議上；同樣引起了有趣的討論。下面發表的便是英國作家所提的問題和蘇聯作家的答覆的全部譯文。

J·B·普里斯特萊：英美的作家習慣上常與他們的代理人或出版者討論計劃中的作品。蘇聯作家跟什麼人討論他們計劃中的作品呢？

沙謨爾·瑪爾薩克：蘇聯作家之間廣泛地實行着預先討論計劃中的作品的主題，材料和形式。首先，這是由蘇聯作家協會及其各小組（散文作家組，詩人組，劇作家組等等）來進行的。其次，則由出版局來進行討論，在這裏，一個作者的作品通常是交給同一位編輯，以致他便是這位作者的第一個讀者，顧問和批評家，連續好幾年之久。如果這個計劃中的作品是一個劇本或是一個電影脚本，它的計劃常常由劇場和製片工作者來進行討論。

然而，這樣的一種事先討論，並不是必須舉行的，當然，有一些作家在他們寫作之前是不願意討論他們的作品。

瑪麗達·夏金揚：在我們看來，討論寫成的草稿（在作家協會各部的會議上，在作家俱樂部中，在讀者會上，在圖書館中等等）比討論一部作品的計劃更為有益。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不討論我所想寫的東西；我依然相信舊的習俗，孩子未出世，不講孩子。

J·B·普里斯特萊：假定一位蘇聯作家用盡了他的版稅，但是，爲着某種理由覺得並不準備寫什麼，那末他怎麼辦呢？

瑪麗達·夏金揚：一個蘇聯作家需要錢的時候，可以向「文學基金會」取得一筆貸款。這是一個作家互濟的團體，它的基金是由出版局和劇場捐獻每部已出版作品的版稅十分之一（但是並不從作家的版稅中扣除，作家的版稅是全數照付的）和每場戲賣座收入的百分之二而來的。如果有必要的話，「文學基金會」也供給作家及其家屬療養的便利以及其他形式的援助。

必要的時候，一個蘇聯的作家還可以從「文學基金會」得到一筆不需償還的贈金，或是接受一家報紙，出版局或是雜誌的委託，出去旅行並寫作他的經歷，或是爲一部作品搜集材料，一切的費用均由該委託機關付給。

喬治·姆第凡尼：按照蘇聯的版權法，劇作家得從全國各處所有演

出賣座收入中提取百分數。電影脚本作者根據影片的發行額提取百分數。散文作家和詩人則按照舊作品的每一版提取版稅，並且得向出版局預支計劃中作品的版稅。

此外，他們還可以從『文學基金會』得到援助。

尼科萊·吉洪諾夫：如果一位作家不能預支一部新作品的版稅（倘使他還沒有着手寫作），他還有很多維持生活的機會。他可以爲任何報紙寫任何题目的專文，爲各種期刊寫人物故事，新聞縮寫和雜文，他還可以在廣播中選讀他的已出版的作品。此外，他也可以在工人俱樂部等處朗誦他的作品，或者，按照與『文學朗誦局』所訂的合同，他可以游歷蘇聯各城市，演講或朗誦他自己的小說或詩歌。此外，他還可以編譯蘇聯各民族文學的散文。其次，他也可以爲製片廠工作，編寫電影脚本，新聞片的字幕或是有聲片的對白。他也可以寫作關於各種通俗問題的小冊子。

如果由於健康不良，所有這些機會他都行不通了，他將以前赴休養地或病

院的形式從作家協會理事會或者「文學基金會」得到幫助或是一筆贈金。

賈克·林德賽：自瑪耶可夫斯基以來，究竟已經發現了怎樣的方法，使詩歌與口語結合起來？

瑪麗達·夏金揚：這是一個極有趣的問題。在我看來，戰時爲我國軍隊寫作的詩人們似乎在這一條路線上獲得了一些進步。詩歌與口語結合的過程，在居住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如亞塞爾拜然，土庫曼尼亞，卡薩赫斯坦的各民族的文學中來得特別顯著。這些人民的詩歌的語彙，從前包含着華美的東方式的隱喻，大多數出於阿剌伯或波斯的語源，但是，現代的白話開始佔得優勢了。

沙謨爾·瑪爾薩克：瑪耶可夫斯基對於結合詩歌與口語方面盡了很多力量，但是他並不是向着這一方努力的唯一的詩人。今日的蘇聯詩歌中包

含着很多來自人民的音調。我國的文學語言已經因為許多採自地方方言的詞藻與白話而豐富起來。濱海州，烏拉圖，西伯利亞，斯摩稜斯克州以及我國廣大的國土上其他各地的方言，在我國詩歌用語上都留下了它們的痕跡。

尼科萊。吉洪諾夫：蘇聯詩歌，尤其是俄羅斯詩歌，具有着很多的特點，而作詩法也已經向着許多不同的方向發展。近年來，尤其是在戰爭期間，已有一種顯著的走向樸素化的趨勢，給予詩歌更大的明瞭性。而且，當然，也幫助它與口語，與自然的音調發生聯繫：這種聯繫，在戰時因為詩人的語彙中增加了許多新的字眼，而加強了起來。用沒有個性的暗比，那是不可能描寫過去這幾年的經驗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複雜的詩歌已經滅跡了；也不是說所有的詩人現在都以類似的風格寫詩了。每一位詩人都保留着他自己風格的特點。自然，也因為用詞誇張以及其他詩歌的用語而複雜化了的瑪耶可夫斯基的風格，並不是被盲目追隨着的，但是，在許多他的同代詩人以及新的一代青年詩人的作品中，却可

以發現他底詩歌的某些因素的影響。

巴菲爾·安托柯爾斯基：瑪耶可夫斯基是詩歌領域中的一位革新者，在他搜求新的，與前代詩人一般公認的成就顯然不同的表現方法這一方面，他是革命的而且大胆的。這是象徵主義者的一種解脫，他們太自由地享用了上帝的神酒神膏，而且因為天上的題材而忽視了人間的題材。瑪耶可夫斯基的作品乃是一個直接的大轉變——回到了人間，回到了現實主義，回到了鮮明而且實在的，可見而且可聽的色調。

這不僅適用於成為瑪耶可夫斯基詩歌許多目的之一的「俗」語。他的具有鄉土性的散文體，乃是他的革命抒情詩一般民主熱情的一個構成因素，但是它們往往伴隨着複雜的隱喻，一種非常精緻的處理和極為高尚的修辭，所有這些是與「俗語主義」很少關係的。所以，我們知道，瑪耶可夫斯基所遺留下來的遺產和傳統是比林德賽的問題所提出的更廣更深的。

在所有蘇聯詩人的作品中，可以在不同的形式中和不同的程度上看出瑪耶

可夫斯基的影響，也許祇有很少的例外。阿賽也夫和基爾桑諾夫是這種影響最有力而且最持恆的宣傳者。這兩位詩人，在他們的搜尋韻律方面，在他們詩歌的用語方面，模倣瑪耶可夫斯基有好幾年之久。塞爾文斯基的史詩和戲劇，他的色彩絢爛的藝術，他的刻劃人物性格以及給予他的每一人物以一種他們特有的語言的這種能力，也大多歸功於瑪耶可夫斯基。吉洪諾夫專獻與西歐各國的詩歌，具有許多瑪耶可夫斯基的痕跡，以及他所特有的一種熱情。萊別達夫·庫馬赤的諷刺也從這同一泉源吸取靈感。

這些例子都是隨便選來的，並沒有透澈說明了這個問題。

羅斯·瑪考萊：歷史和傳記的研究進行到如何的程度？案卷保管所和其他研究性的圖書館究竟是如何的完善？學者利用它們有些什麼方便？最近出版了一些什麼歷史研究的著作？

瑪麗達·夏金揚：蘇聯作家協會和蘇聯每一個較大的國家圖書館中都有案卷保管所。我國的各個國家圖書館都有完善的藏書和檔案。列寧格勒公共圖書館的珍本之中，有伏爾泰私人的文稿和藏書，書中有着頗饒趣味的眉批。學者們可以在圖書館中終日工作（各圖書館從清晨一直開放到下午十一時，每個圖書館每月僅有一天不開放）。學者們在圖書館中工作，可以得到顧問們關於任何科目的忠告和協助，這些，跟書一樣，都是免費的。書籍也可以憑一借據免費借出。

我剛剛接到出版局送來我的關於偉大烏克蘭詩人謝甫欽科的論文集。作為一位語言學博士，除了別的寫作以外，我經常研究文學史。目前，我正在研究十一世紀岡底的詩人尼查米，而且正在把他的詩 *Nizami al-Agha* 譯為俄文。附帶說一句，這首詩哈頓·辛納萊英譯的原稿存在大英博物院。我久已夢想要讀一讀這部譯稿，並且為巴庫的尼查米研究所獲得一份副本。這是可能的嗎？

瓦西里·揚：蘇聯已經出版過很多傳記的和文學的研究著作，例如，科學院出版的有：『英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希臘文學史』，『俄國文學史』；其他有埃爾米洛夫教授關於契訶夫的著作，A·葉果林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解放與愛國的思想』，其他各出版局也曾出版過關於格里波依多夫，車爾尼雪夫斯基，馮耶可夫斯基的傳記作品。

伊果爾·薩茲：這個問題牽涉到我所工作的領域，所以我覺得用幾句話不易回答。在蘇聯，文學史家和讀者大眾都對文學家和一般文人的傳記極為發生興趣。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現在是比革命以前時期做得更廣更深了。蘇聯一成立後，收藏在私有檔案中（皇家法庭，憲兵和警察機關，宗教會議等）兩百年的成千份的原稿，信函，公文，肖像，立刻都聽憑研究工作自由使用了。許多的材料都由私人奉獻給國家圖書館和博物館了。

整個文化機關網的融洽合作，使這些一度秘密的寶藏在登記，分配，科學分析，和敘述方面獲得一種統一的制度，因而使它們成了國家財富的一部分。

蘇維埃派的目錄學，古文學，文字考據學和科學——歷史的評註生成了。因為我國科學家們的工作而引以為榮，我們認為這並不是狂妄的。他們的工作不僅闡明了著名傳記中的若干模糊之點，而且常常有所發現，使得以前的觀念徹底改變。研究的便利以及政府對科學家的支持，已經使重寫拉狄希契夫，克雷洛夫，格里波依多夫，普式庚，萊蒙托夫，赫爾岑，涅克拉索夫，謝甫欽科，車爾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薩爾蒂柯夫——錫且特林，契訶夫，高爾基（亞歷克塞，畢西珂夫）等人真實的傳記成為可能。關於俄國文學與外國文學之關係的許多新材料已經發現。巴爾扎克，梅里美，密凱維支和許多其他外國作家的同胞們，如果不求諸蘇聯的材料，就不能夠編寫關於這些文人們的真正科學的著作。蘇聯各出版局首次出版的若干卷回憶錄，對於傳記家乃是一個寶庫。

即使極簡短地概述一下蘇聯的傳記研究工作，也不是這裏我們能够使用的篇幅所容許的，尤其是，如果我們把對於波里斯洛夫斯基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

的著作（一九四三），以及葉夫蓋尼·南恩關於迭更斯的著作（一九四六年）這樣極端的科學，但是頗值一讀的書的批評也包括在內的話。

所有博物館和圖書館中都設有案卷保管所。若干專門博物館（文學博物館，莫斯科的和雅斯那亞·波爾雅納的托爾斯泰博物館，列寧格勒的普式庚紀念館，塔根羅格的契訶夫博物館，薩拉托夫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博物館等等），都經常不斷地研究傳記目錄學，而且經常出版索引，目錄、和新的書目。這些機關同樣也答覆關於研究方面的任何問題。莫斯科的列寧圖書館和列寧格勒的薩爾蒂柯夫——錫且特林圖書館的目錄和案卷保管所，在讀書中間最負盛名。在這裏，讀者除了獲得任何問題的答案之外，還可以請求抄錄書籍和原稿中的片斷。所有這些機關經常交換情報，而且往往將它們一部份的印刷品聽便它們的姊妹機關索取。

每一個蘇聯公民都可以接近所有蘇聯書籍和科學的寶藏，當然，藏於閱覽地位有限制的專門書庫中的特別珍本與原稿，首先是供給那些最需要它們的人

們應用。學生們，憑着他們的教授或教授會的推薦，可獲得這種優先權。各大學也擁有它們自己的豐富的藏書。

傳記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在蘇聯已經成爲熱烈討論的題目，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這幾年。當時，文學史中存在着一種庸俗的社會學的傾向，這種傾向的代表（弗理契教授和彼雷維爾塞夫教授）非常概念地處理傳記材料；一個作家的創作天才，祇是由一般法則和有關他所屬階級的歷史事實機械地加以說明。這一類型的歷史家們，常常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其實是更爲接近泰納或是較後的霍森斯坦那一階級的資產階級社會學家的。有一個時候，這種因爲它的簡單和表面合乎邏輯的客觀性而吸引人的傾向，曾有過很多的主張者。但是它從未佔得優勢，而到三十年代初年，因爲關於這個問題口頭與文字的討論而終於無人相信了。對於純心理的，非社會的研究及其基於時尚的無恆和個人的嗜好而發生的武斷的觀念，我們則更不感到興趣。

蘇聯的文學史將一切的傳記研究置於馬列主義理論關於個人在歷史中之作

用的一般觀點的基礎之上。這種理論把任何一個人的精神生活視爲他那一時代社會生活的反映。個性是在社會的影響之下形成的。心靈從環境的現實中攝取思考的材料，並設法解決由這現實所產生的問題，性格的特點和個人的心理，在他精神和道德觀點的形成方面當然具有某種的重要性，但是，就它們本身來說，祇是在對於具有一種社會性的更強大因素的關係中，它們才獲得意義。例如，可能是癲癇病使杜斯妥益夫斯基更易於見到並且表現人類和社會生活之某些方面的；但是，在說明他的個性和天才時，對於這種神經——心理的疾病加以過甚的重視，我們認爲這是可笑的；世上有着千百萬的癲癇病患者，但是祇有一個杜斯妥益夫斯基。一個作家童年的家庭環境，他的教養，他對一個女人的戀愛等等，在這個作家的作品的特性方面無疑地起着一種決定的作用；同時，似乎毋須證明，所有這些，無論在每一種情形中是如何的不同，往往是帶有歷史時代和社會環境之印跡的。作家的階級根源具有着一定的意義，但是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主張：社會根源完全而且永久地預先決定作家的世界觀。在這

裏，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列寧曾把貴族列夫·托爾斯泰稱爲『俄國農民主革命的表現者。』

強調指出這一點是重要的：在我們看來，個人本身乃是社會勢力複雜的相互作用唯一而且獨特的反映，他對於產生他的社會所抱的態度是不能消極的。人，用他的行動影響別人的意識和他那些社會的意識。如果說：一個作家的個性和生活祇有通過社會和歷史的研究才能被真正理解這句話是對的，那末，反過來，對於一個傑出作家的生活所作的傳記的研究，就會使我們對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知識豐富起來，並且使我們更深一層理解他的天才。

達瑪拉·莫蒂萊娃：蘇聯政府以公款資助文學史和古典作家傳記的廣泛研究。著名的文學史家們不僅得到他們作品的版稅，而且也領有薪水，因而能够不慌不忙的工作好幾年，準備寫作廣博的史書，編寫托爾斯泰傳記巨著的古塞夫教授，和多年來寫作普式庚年譜的茨雅夫洛夫斯基教授，都是蘇聯科學院的職員，並且在他們從事這些研究的期間接受政府的薪水，這使這兩位